

当代浙江学术论丛

浙江现象 与 浙江学术

——浙江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展望

主 编：连晓鸣

副主编：谢利根 刘 东

浙江日报出版社

当代浙江学术论丛

浙江现象 与 浙江学术

——浙江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与展望

主 编：连晓鸣

副主编：谢利根 刘 东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现象与浙江学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80206-791-2

I. 浙… II. 浙… III. 学术思想—浙江省—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8510号

浙江现象与浙江学术

作 者: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刘书永 田 苗 刘 彬

封面设计:何成宝 丛林雪

责任校对:徐为正 董田莉 陈群峰

责任印制: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邮编100062

电 话:010-67078234(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h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 订: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690×975毫米 1/16

总字数:310千字

印 张:17.5

版 次: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6-791-2

定价:3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研究浙江 服务浙江

繁荣当代浙江社科研究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陈 荣**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艰苦创业、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富民强省之路,被誉为“浙江现象”或“浙江模式”。“浙江现象”是对浙江人民波澜壮阔的创业创新实践的高度概括,显现出内涵极其丰富的理论创新的引领力量,同时也深深地滋养着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使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是全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生动缩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1978年全省生产总值为124亿元,2007年达到18780亿元,年均增长13.2%,经济总量列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由1978年的331元增加到2007年的37411元,列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后,居全国第四位,年均增长12.1%,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人均GDP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浙江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三大历史性跨越。

浙江综合实力的提升,为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浙江人民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浙江人民创业创新的不懈探索,为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取之不尽的经验素材。实践,永远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浙江现象”造就了当代浙江学术研究的理论富矿。浙江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个一个崭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为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理论提炼的空间。浙江的

理论工作者十分注重从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现素材，汲取养分，通过深刻的理论思考，立足浙江、解读浙江，把浙江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成果，努力推出具有时代特点、浙江特色、浙江风格的精品力作，有力地推动了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

浙江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既体现了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活力，又展示了理论创新的伟力。理论创新是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的先导。浙江30年来的发展进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照之光”照耀下不断推进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的有力证明。浙江理论界积极开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研究、宣传，努力把握和运用现代学术研究的创新成果和分析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为主攻方向，研究浙江、服务浙江，积极为推进浙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献计献策。浙江理论界以课题等科研项目为平台，开展调查研究，分析现状，揭示问题，剖析根源，提出对策，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理论界还以理论研究为载体开展交流探讨，追踪浙江改革发展的最新动态，相互交流最新研究成果，为政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咨询建议。推进理论创新、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融入并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神圣职责。

浙江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必须依托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撑。浙江省委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推进“两创”总战略，要求我们理论界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等系列研究，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继续深化对“两创”总战略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探索，不断拓展新视野，明确新方向，提出新举措。理论界要深入总结浙江的历史经验，准确分析浙江的生动实践，主动探索浙江的未来趋势，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前瞻性、高层次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的发展历程，是值得深入总结、挖掘、研究和宣传



的理论宝库。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中华读书报》合作，开设了“浙江现象与浙江学术”专栏，组织并邀请了我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撰写文章，选取改革实践中的典型侧面，回顾和总结浙江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具体反映浙江学术发展与浙江改革开放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浙江实践经验中所蕴含的理论创新的引领力量，展示浙江创新实践对浙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启迪和滋养作用。这项活动得到了专家学者的热烈响应，撰写了一批兼有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得到了《中华读书报》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大力支持。

与有重要影响的新闻媒体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发表系列理论文章，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首次尝试。这项活动既是研究和宣传浙江改革开放经验和成就的有益探索，也是浙江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体展示，有利于省内外国有志于研究浙江现象的学术界同仁的交流与合作。

鉴于报纸版面容量有限，报社在刊发文章时作了必要的压缩和删节。为使读者一睹文章全貌，现将刊登《中华读书报》的理论文章汇集成册，予以出版。

是为序。

2008年11月30日



目 录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浙江模式”	陆立军 任光辉 / 1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	葛立成 / 6
温州模式：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	张仁寿 / 12
专业市场与义乌商圈	陆立军 任光辉 / 22
浙商：演绎当代中国第一商帮传奇	杨轶清 / 31
从传统“艺商”到“新浙商”	陈立旭 / 43
区域发展视野下的产业集群	盛世豪 郑燕伟 / 54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路子的浙江样本	邵 峰 / 61
统筹·均衡·和谐：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	邵 峰 / 65
城市化：一石激起千层浪	郭占恒 / 74
——浙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探索	
中国农民的城市梦	朱康对 / 86
——龙港农民城建设追忆	
省管县体制与强县扩权	卓勇良 / 96
——改革开放 30 年浙江制度创新在中国的重要实践	
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创新与实践	钟晓敏 叶 宁 / 107

“法治浙江”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浙江经验	陈柳裕 / 115
村民自治：浙江的创新	余逊达 / 124
浙江村庄的转型与前景：三个关系维度	毛 丹 / 137
“新浙江人”及其社会学意义	杨建华 / 158
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陈剩勇 马 斌 / 179
从传统“文化事业”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浙江重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自然历史过程	陈立旭 / 187
蓬勃发展的浙江文化产业探析 ——浙江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体制改革	姚 休 / 204
均衡·优质·公平：改革开放 30 年浙江教育的发展之路	周谷平 施光明 / 225
顺势而为：“有效政府”的浙江样本	何显明 / 237
公共财政与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的实践与经验	钟晓敏 / 246
弘扬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	陈立旭 / 255
后记	/ 266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浙江模式”

——浙江省特级专家陆立军教授访谈录

□ 陆立军 任光辉

任光辉：陆老师，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浙江从一个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省份，发展成为市场大省、民营经济大省、出口贸易大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称为“浙江奇迹”、“浙江经验”、“浙江之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此，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术界在“浙江模式”方面的研究？

陆立军：学术界最早对浙江模式系统性地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许多学者尤其是浙江省内学者从浙江民营经济、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小城镇建设、制度变迁等角度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这些研究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迪。在吸收借鉴他人成果，更主要是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其内涵可概括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制度变迁宏观背景、发展环境下，浙江农业、农村领域由内源性力量推动的市场化变革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并逐步走向国际化的道路。可扩展性是它的一个很大特征。

任光辉：任何一种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都应该具备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当初的温州模式以民营经济为特色，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特色，浙江模式作为涵盖面更广的区域发展模式，总体上也应该具备一些自身的特点。那么您认为它的地方性特色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陆立军：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对某个成功区域发展特征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其发展经验的提炼，特别对于浙江这样一个由民间力量自下而上推动经济发展的省份来说，它的发展特征中蕴含着一些内地省份可以借

鉴的成分，换句话讲，浙江模式既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意义。我们认为浙江模式的地方性特色主要表现在：（1）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自主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2）在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的政策环境下，活跃而充裕的民间资本渗透到浙江的各行各业，并逐步在区域内形成了民众投资、民间营运、全民分享自我循环发展体系；（3）浙江经济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而是体现了由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驱动型特点；（4）市场力量发挥了自组织的功能，政府则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

任光辉：您刚才概括出了浙江发展整体上的几个特征，但当我们依照地理范围将浙江进一步划分为几个区域时，可以发现浙江各个区域的发展又是不太一样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区域发展的差异？温州模式是这些模式中较早引起学术界关注的，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温州模式与浙江模式二者的关系？

陆立军：是的，改革开放近30年来，浙江各地积极探索反映自身实际、符合客观规律的区域发展模式，努力走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浙江特点的和谐发展之路，创造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经验，丰富了浙江模式的内涵和区域特色。浙江模式除了包含“无为而治”的典范、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温州模式外，还包括以小商品市场闻名世界、市场主导与政府有为相结合的义乌模式，以及以和谐创业为内涵的杭州模式，国有、集体、民营、外资经济四轮驱动混合发展的宁波模式。此外，接受上海、苏南、浙南等多方面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的典型代表“浙北现象”，所有这些都是浙江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温州模式主要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是一种农村地区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其间伴随着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与变迁。它的动力来自温州的老百姓，来源于温州在民间资本基础上形成的归属明晰、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同时，温州模式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动态模式。从历史上和逻辑上分析，可以认为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然而，浙江模式比温州模式所涵盖的内容、特色更加丰富。

任光辉：能否给我们简单概括一下您所强调的浙江模式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特征，或者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脉络？

陆立军：上一个问题中已经谈过温州模式，我这里重点谈一下义乌以及



浙江其他区域的发展模式。

学术界关于义乌模式概念的提出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这方面，我曾将义乌模式的内涵界定为：“通过实施兴商建市的总体发展战略，同时注重以商促工、以商强农、科教兴商，推动农村经济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3年，我和白小虎、王祖强等人完成的《市场义乌》一书，对义乌小商品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2006年开始，我们逐渐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以义乌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提炼出了“义乌商圈”这一概念，从而将义乌模式的研究视角拓展到与义乌小商品市场相关联的国内外所有区域和经济主体的分工协作关系上来。此外，其他学者如包伟民、王一胜等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域的发展作出了总结。

杭州依托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立足自身文化积淀和城市特色，从政府到企业，都比较注重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注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逐步形成了和谐创业的发展模式。宁波所走的是一条“混合”经济发展道路，国有、集体经济在“混合”中增强了控制力，个私经济在“混合”中开始了第二次飞跃，外资经济在“混合”中水涨船高，四者共同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对于浙江其他地区，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浙北特定的经济环境和内在动因，造就了嘉兴独具特色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台州的民营经济主导与政府推动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发展路子；绍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即“乡镇基础、民营机制、市场经济”；湖州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走出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生态经济发展之路；金华下辖八县市之间文化相近，产业之间的依存度甚高，因此其特色和潜力是城市群；衢州所走的特色产业之路的实质是对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两大理论的有机融合与创造性运用；丽水所走的是“谋求跨越发展，促进和谐融入”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舟山依托独特的海洋资源优势，实现了从以渔业为主的海岛经济向以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为主的海洋经济的历史性跨越。

任光辉：一开始您谈到浙江模式的可扩展性，我觉得很有趣。在我个人看来，某种模式的可扩展性，有点类似于生命力的东西，意味着其可以继续在内外部深化和向外延伸。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与您提到的扩展性在意思上是

否一致？

陆立军：大体上和你理解的相似。浙江模式是一种新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在内源性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的形式是内生型的，更加稳定和更具有可持续性。

具体而言，浙江模式的可扩展性即生命力主要表现在：（1）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元混合的企业产权结构，这种新的财产秩序和新的财产所有结构提供了内在的、清晰的、可累积和可控制的产权激励机制，可供中国其他地区的所有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借鉴或参考；（2）浙江的专业市场为地方工业、产业集群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3）浙江企业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从个体作坊、家庭工商户逐步向现代公司制企业发展的鲜明轨迹，逐步实现了从生产加工型企业向大规模品牌生产集团与商贸集团的转变；（4）浙江民营企业在实力提升的基础上，率先“走出去”发展，主动参与国内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5）浙江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到机械、电子、汽摩配等重化工业再到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显著轨迹，地方产业集群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之中；（6）浙江私营企业中存在的劳资争议和劳资冲突，其性质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关系，而是反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差异的非对抗性关系，合作、互利仍是劳资关系的主流。（7）浙江逐步形成了以市场化和效率优先为主要特征且富有自身特色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明显扩大，正走在通向共同富裕、和谐发展道路上。

任光辉：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浙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浙江经济在发展方式、政府职能、发展环境、资源配置效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升级等方面都需要实现转变或提升，我还想听听您在浙江模式转型或提升方面的看法。

陆立军：可以说，浙江模式的精髓就是“两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两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今后，促进浙江模式转型与提升，就要大力实施“两创”总战略，整体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着力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保障民安。为此，须着力实现以下几个转变：（1）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进市场意识、理念在各个领域的深化，努力构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



体系；（2）引导产业结构加快向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转变，依靠创新来推动全省经济向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率，全面化、长远性、可持续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型方向转变；（3）加快由农村工业推动工业化向由城市、城区企业集群与城市群联合带动工业化的新型道路转变；（4）积极地融入全球化的竞争环境，走国际化之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吸收国外的先进元素。

陆立军，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
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任光辉，浙江工商大学助理研究员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

□ 葛立成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版图上，浙江无疑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30年来，浙江已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居民得益最多的省份之一。2007年，全省以占全国1.1%的土地面积、占全国3.8%的常住人口，提供了占全国7.6%的经济总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连续7年、2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浙江的“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小资源、大经营”，“小资本、大集中”和“小城镇、大发展”等形态或格局，更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广泛的关注。

浙江现象何以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我看来，最重要或最根本的在于：在这30年的发展过程中，浙江成功地构造了一大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千千万万的实践者。

这种“构造”进程，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一、大胆放出一批原生的市场主体

浙江是一个民营经济大省。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出率和商品率，另一方面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创造了条件。浙江各地群众的创业积极性空前高涨，择业自主性大大增强，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崛起，这反映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温州、台州等地区，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利用家庭场地和自筹资金，兴办起了“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企业，由此形成了一大批原生的市场主体。

对个私经济的发展，浙江理论界并没有纠缠于在概念上对姓“社”姓“资”问题的空洞争论，而是着眼于如何利用比较优势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区域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更好地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个私经济的性质、个私经济的萌生动因、个私经济的运作机制和组织形式、个私经济的行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个私企业主的特点等，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探讨和分析，满腔热情地为全省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1986年6月的“‘温州模式’理论讨论会”和1988年9月的“浙江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现状、政策理论讨论会”，在省内外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打破“唯成份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先发展、后提高”的思路，大力支持千百万群众的创业实践，大胆突破单一公有制结构，大胆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温州、台州等地较早就提出，要“不论成份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浙江省委、省政府尊重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明确提出“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要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依法保护力度，加大环境整治力度”；让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经济上有实惠，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引导个体私营经济“上规模、上水平、上档次”，适应市场竞争的变化，不断提高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努力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由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已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978年全省个体工商户仅2000多家，私营企业几乎为零。而2007年底，全省已有私营企业45万家，投资者102万人，注册资金8664亿元，从业人员657万人；个体工商户181万户，注册资金655亿元，从业人员391万人。全省个私经济的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出口创汇额等项指标，已连续8年居全国第一。在最新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203席。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千百万充满创业冲动和竞争活力的市场主体。这些原生的市场主体，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加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促进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小城镇建设，拓宽了城乡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增加了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同时，也从市场观念、创新意识、经营机制、用工和分配制度等方面，为公有制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从资产流动重组、富余人员下岗再就业等方面，为国有集体企业深化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率先改出一批重构的市场主体

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的乡镇集体企业异军突起。由于这些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更灵活的经营机制，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组织生产经营，可以实行择优上岗、按劳取酬、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等等，因而它们“多轨运行，多业并举”的迅猛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毋庸置疑，这些企业并不完全具备市场主体的基本特征。随着宏观体制环境和市场竞争条件的改变，乡镇集体企业的制度性缺陷逐渐显露，产权模糊、政企不分、治理结构缺陷、竞争力减弱等问题日益突出。

为此，浙江许多地区积极探索采用股份合作制等组织形式，率先对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以产权制度为中心的改革。股份合作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产权明晰、利益直接、风险共担、机制灵活的制度安排。它建立了法人财产制，实现了财产最终所有权与实际营运权的分离，明确了出资者、企业法和经营者的权责利。它既保持了劳动合作的基础，又避免了走“一讲合作就合并财产”的老路，保证了入股者的权益和企业的凝聚力。它突破了分散经营的局限性和单一的产权结构，增强了对生产要素的吸纳和集聚能力。它还形成了体现“劳动”与“资本”基本平衡的分配制度和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为基本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这样，为了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最大限度地伸展自己的利益边界并相应地减少政治风险”，全省乡镇集体企业纷纷进行“转制”，形成了一批产权关系明晰、生产经营自主的市场主体。

浙江理论界及时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明确提出农村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浙江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制度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尽管它很不“规范”：既不同于完全的股份制，又不同于完全的合作制；既不是单一产权主体的集体企业，又不是多元产权主体的合伙企业；有人称之为“非驴非马的东西”。但这种产权安排和企业组织的形式，却是与浙江农村既定的制度环境、与市场机制的发育水平和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相适应的。因此，它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对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积极而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相关的理论研究还结合浙江的实际，对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安排、分配关系、治理结构、功能绩效、生存空间和制度潜力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不少成果引起了决策部门的关注，转化为政策举措，推动了实践的发展。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进一步总结台州、温州等地创造的股份合作制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产权可以量化、职工可以参股、经营者和企业骨干可以持大股”等具体政策，为乡镇集体企业明晰产权、搞活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全省各地解放思想，勇于实践，大胆探索，至2001年底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面已达到97%，不仅盘活了集体资产存量，促进了产权流动重组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了明晰的产权关系、多元的产权主体和有效的产权结构，而且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掀起了增加投入、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的高潮，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后劲。

三、积极扶持一批引进或嫁接的市场主体

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用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而浙江又是资源小省，经济发展必须走“两头在外”的外向型路子。

对此，浙江理论界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较早就提出了全省要积极推行开放型发展战略。1985年6月召开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讨论会”明确提出：浙江经济战略的总方向和趋势，是要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积极打入国际市场。许多专家学者围绕着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特征，外贸、外商直接投资和境外投资对浙江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外向型经济的路径选择，WTO框架下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问题，企业“走出去”战略和“以民引外”策略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效促进了全省的招商引资、“三资”企业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政策，不断加大发展“三资”企业和推进开放型经济的力度。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浙江逐步下放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限，简化了审批手续，改善了外商投资软环境，规定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的具体政策。同时，设立省外商投资管理局，专门从事对外招商引资的领导、组织、管理和服务，实行一个口子对外和一条龙服务，加大吸引外商投资企业的力度。各市、地、县也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举措。新世纪以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浙江着眼于拓展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出口主体、产品、市场和方式的多元化，落实出口退税改革措施，加快推进大通关建设和口岸开放，加强对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支持和服务，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发展。